

赵树理小说: 民间性与现代性

江 卫社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 要] 赵树理小说体现了民间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全面口语化上,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农村民主实现、人性解放、民间文化生态的独特理解等方面。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思考,是以一种传统文学的“载道”性方式表达出来的。

[关键词] 赵树理小说; 民间性;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16(2003)02-0047-05

一

一般认为,赵树理小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最典型、最到位,也是最成功的文学实践,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这种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什么说赵树理小说最能体现这种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呢?因为赵树理小说采用的是我们民族传统中最为深入民间的艺术形式——民间说唱文学的形式,评书的形式,传统通俗小说的“演义”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民间流传最为深远,能最大限度地“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正如新文学运动从“白话文”运动入手,赵树理小说的这种突破也是从语言这一层面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大众化”。赵树理在论述创作时,常常提到的是语言问题,而对于创作方法,则谈得比较笼统:“我觉得熟悉生活和写作方法是很难分开的”,“我们不要强调追求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创作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作品”,“我对写作方法可以说是囫囵的学法,无非是多看人家的书,这个人怎样写,那个人又怎样写,看多了,自己也会塑造了”。笔者以为,赵树理对创作方法的笼统论述似乎表现了他对新文学引进的各种“主义”的一种有意无意的回避,从而为他绕过自己也曾受其熏陶的新文化传统,重新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写作的价值定位,再一次改头换面地运用曾经受到过新文学强烈批判的传统手法的合理合法性作了辩护。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以笼统的面目出现,否则对他的

“手法”人为提升将会是对新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反讽。联系“当赵树理写出大众化精品《小二黑结婚》后,居然找不到地方发表!”^[1]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解放区作家还是以受过“洋化”教育的人居多,如果不是有组织上、领导人(彭德怀)的举荐,赵树理的“异军突起”也许还要有更多的曲折。我们这样说,无非是想说明,赵树理小说最大的一个“贡献”,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他的文学语言提炼方面所达到的“化”境。它突破了所谓五四“新文言”的与大众隔离,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方言的“地方性”局限,而代之以平实简洁朴素的说唱语言,一种面向全体民众、听众的口头语言。他的小说不仅是给人“读”的文学,而且是能“说”给人“听”的文学。这种能“说”能“听”的语言完全来自民间,来自传统,来自民族。赵树理在谈到他如何处理语言问题时说:

我对运用语言方面的看法,一向不包括在写法中。我以为这是个说话的习惯,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说话时候都有他们的特殊习惯,但每一种特殊习惯中也有艺术的部分,也有不艺术的部分。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结果在“艺术化”方面只是能“化”多少“化”了多少(根据我的能

[收稿日期] 2002-11-30

[作者简介] 江卫社(1969-),男,江西婺源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生。

力),而在保持习惯方面做得多一点而已。^[2]笔者以为,在照顾共同的艺术化要求下,赵树理刻意保持的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说话的”习惯。割舍对于方言的迷恋,而在写作中保持自觉的“读者”意识(即叙述学理论所谓的“隐含读者”),面向全中国的农民,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找最佳的语言结合点,这正是赵树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

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艺术化也体现了极高的“化”功的话,那么,这种“化”功更多的从语言层面体现出来。即“化”书面语为口头语,化地方性为普遍性,化陌生化为通俗化。对此,赵树理是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并把它作为一生努力完善的境界。他说过,“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写出来不能够说,是我做得不够”。^[3]众所周知,口传性是民间文学最为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而赵树理小说把这个特征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来实践,并获得了较大成功,这是民间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胜利”,这种“胜利”的意义也因应和着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而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为提高民间大众、民间文化,继而提高民间最大多数——农民历史地位的一个文化象征。但不管作家本人有没有一味迎合政治性宣传的赶时代意图,不管他是否是那种“中国农村传统中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民间艺人”,^[4]他的这种文学追求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实现了,而且达到了一种比以往任何作家更为“自然而然”的境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不仅人物对话是口头语、大白话,而且叙述语言都是口头语或口头化的。叙述人是以一个全知的、讲故事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一种“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模式”)。这是一个突破。请看《小二黑结婚》里的开头一段的叙述:

刘家峪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作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这种叙述语言能说,读起来也像在听故事,就是读给不识字的农民听,他们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这即是作家所要达到的语言效果,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化实际,着眼于民间欣赏趣味的大众化追求,也即是当时历史语境中所理解的文艺的民族化方向!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人物对话方面大多做到了体现人物特有的身份、地域、教养、性格等方面的

特征,但叙述语言却免不了“欧化”和知识分子腔调,都没有达到真正的通俗化、大众化效应,乃至三四十年代的很多作家运用方言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看懂,而是为了塑造人物,力图使人物达到“地方性”与“国民性”的统一,因而方言的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影响了作品的读者面。而赵树理小说却没有那种因方言过多而造成的阅读困难。他的人物语言不是靠方言化达到通俗化效应的,而主要靠的是真正地实现了胡适所说的“白话”之“白”: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口,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的晓畅的话。^[5]这三个条件在小说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中同时实现,而且即使针对中国最底层劳动人民——农民这一读者对象,也能实现。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赵树理才真正做到了,这主要得益于他是一个真正来自乡村民间的作家。

实际上,并不仅是赵树理的出身给他带来了这种幸运,而是他所受的文化影响及个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选择与其他作家不同。语言的选择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也是作家对中国民间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艺术运营的结果。他曾经说过,“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6]可见,赵树理也是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而且他也认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更有赖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他的创作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学传统——面向民间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发展,新变化,新运用。

二

赵树理小说用的虽然是民间语言形式,小说结构也是一种带有“大团圆”结局的、改造过的新章回体,但他于四十年代开始的创作却是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的艺术结晶。他较为成功地使五四以来白话文学与大众相隔离的状态得到了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文学大众化与化大众、改造民众与适合民众的困境。赵树理小说成功实现了白话语言的民间性转化,这种转换也因小说在民间形式下的现代性意蕴而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成为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

那么,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意蕴从哪些方面得到了体现呢?

首先,是对农村实现民主的文化忧虑。民主的实

现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意识问题。在赵树理时代的解放区农村,民主已经在形式上得到了实现,选举已成为民众参与的一项基本政治生活。但农民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与帝王思想使他们失去了行使这一权力的文化心理资质,而有着丰富的封建统治经验的农村地主及其追随者们却能够在民主的外壳下挥发他们封建专制的余威。因此,在赵树理小说中,新政权里的旧人物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赵树理正是看到了在民主与封建两大势力的较量中,农民存在的弱点及恶势力往往得逞的现实,才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引起人们特别是上层的关注。如《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兄弟,正是利用了农民在动荡中形成的政治冷漠而混进了村里的新政权组织,从而为他破坏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以及在村里作下的“五六十款”罪行取得了一时的合法性。当代表农民利益的共产党赋予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机会的时候,农民却还没有这种文化心理准备,他们的观望、推让直接造成了恶势力再一次的横行乡里。只求“做稳了奴隶”的臣民意识、奴化心理使他们再一次屈从于恶人的当道。

这种妨碍民主实现的障碍不仅来自农民普遍的政治绝缘与半绝缘的文化心理状态,还来自他们也渴望成为有产者,一旦有条件就成为新的“人上人”的潜在剥削者意识。《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一当上干部就沦为新的剥削者,《邪不压正》里的小旦、小昌等人一得势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这说明,要在农民的文化意识里输入现代民主意识,远远不是建立一个形式上的民主政权所能奏效的。大多数农民自身并不具备推翻压迫他们的人的经济能力与思想素质,只有靠党的力量的支持,在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的教育与扶持下,他们才能成为村里的主人。而巩固这种已经取得的政权,不让新的村领导成为新的统治者,还会继续成为摆在农民面前的问题。他们不能指望“救命恩人”,他们真正的解放只能靠他们自己,正如《李有才板话》里的老杨同志教育老秦时说:“你的真恩人是农教会,是全村民众,哪里是我们?依我说你也不用找人谢恩,只要以后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点,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平实的话里道出了“民主”的真正内涵——个人的自觉才会有集团的力量,集团的力量也会因个人的自觉、民主的实施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里革命意识的播种者、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小常向村里人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时,强调要让一个国家里大多数人“有权,有钱”,人们才会爱国。他说,“没有钱,吃穿还顾不住,哪里还能救国?……

没有权,看见国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哪里还有心思救国?……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几个人把这座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啦?”这里包含的正是一种现代的国家意识、民主意识,个人作为一国之公民的权力与义务意识。小说从抗战前的八九年开始,一直写到翻身后的李家庄公祭死难的英雄与村民,送参战人员上前线结束,历史地再现了人民民主政权在农村建立的艰难历程。同时小说也意在告诉读者,像铁锁这样的农民虽然不识字,但他们深受地主李如珍等人的压迫,又在城里、军队里当过差,长了见识之后,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农村革命的带头人。在改造农村旧政权的过程中,发动农民,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根本的出路。小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对急于弄明白阶级压迫根源的铁锁进行思想开导,让他觉得农民一旦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组织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就会解放自己。小说形象再现了农民铁锁在找到了党的工作者“小常”之后一步步觉悟起来的心路历程。铁锁成长的艰难道路也正预示了农民真正翻身为主人,民主真正在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得到彻底实现的痛苦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次,是对人性解放问题的现代性思考。人性解放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旨,人性解放体现为:在人与现实的关系中,人的自主自觉意识的充分彰显,个人能在各种行动中最大限度地体现自我的意志,不受社会的强制性的压迫,也即人的思想意识与行动达到在认识必然基础上的“自由”境界。一个社会人性解放程度,自由程度往往从人最基本的需求——“性”与“爱情”的方面出来。婚恋恋爱问题总是一个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晴雨表,因而,在宣扬人性解放的时代,恋爱婚姻往往就成为文学写作的聚焦点。五四时期,宣扬个性张扬、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男女平等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表现的主要题材。而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在赵树理笔下,这些问题再一次得到了平实而深刻的表现。但此时,赵树理小说反映的婚恋恋爱问题、男女平等问题不再是停留在“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苦思阶段,而是体现了一个能从制度上保障人的这种基本权力得到实现的新时代——尽管这种实现是经过斗争而得来,但在赵树理笔下,这种斗争毕竟“胜利”了。赵树理正是看到了这种“胜利”的困难,他的小说对人性解放在新历史条件下乐观化的叙述才显出了其思考的“现代性”。赵树理小说尽管采用的是乐观幽默的民间叙述基调,但在这种幽默之中,却

掩不住作家对农民现实处境的隐忧。这点只要看看李有才那些“含泪带笑”的快板就清楚了,在那“模范不模范,从东往西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的幽默里,谁能不为农民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仍然被地主剥削的现状暗暗垂泪?小说《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写而成的,现实中的“小二黑”被迫害致死了,而小说里的小二黑却取得了胜利。赵树理对乡村人性解放,自由恋爱悲剧的艺术化处理,宣告了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表达了作家对现实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时的理想情怀,和对农民历史命运的人道主义关爱。

再次,是对民间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对民间以神道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封建迷信的批判,对封建婚姻观念的抨击,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的反思,是赵树理小说继承、发展五四民间文化批判主题的标志。但与五四时期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不同,赵树理在进行民间落后文化观念、落后习俗的批判时,却更多地灌注了农民在这些旧文化观念下隐含的人性内容及作家的人道关怀。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充分理解了他们之所以落后的历史文化根源,因而对农民的落后抱的是理解与同情态度,即使是叙述中包含着讽刺与幽默,也是善意的。他激烈批判的是农村中的恶势力及其代表的民间流氓文化、痞子文化。《小二黑结婚》里,赵树理对三仙姑与二诸葛态度是善意的嘲弄,而对金旺兄弟则是激烈的抨击。小说还涉及到一个新文化对旧文化尤其是民间神道文化的改造问题。应该看到,两位神仙在利用、宣扬民间神道文化的行为上,包含了丰富的人性内容。三仙姑的“下神”,起初是因为嫁给于福这样一个“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的男人的不满,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一种扭曲形式的反抗。后来的她利用青年们来问神的机会,弥补精神的空虚,在吸引青年男子的注意中得到一种可怜的满足。包括她阻挠女儿与小二黑的婚事,也是因为“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这一近乎变态的心理在作祟。在装神弄鬼的外衣下,我们看到的是三仙姑对情爱的渴求以及这种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变态行为方式。二诸葛的求神问卦,包含着他对子女未来生活幸福的关怀,他教孩子读书识字,以至小二黑从小就会算卦,尽管二黑因此受到村里人的奚落,但这并不是二诸葛的初衷,他反对儿子与小芹的婚事,也是因为他算出儿子与小芹命里相克。他给兴旺下跪,求区长恩典恩典,都是为着儿子的一辈子考虑。在二诸葛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懦弱、谨小慎微,企图利用神道力量祈求幸福平安的乡村老汉形象。在二诸葛

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作家生身父亲的影子。作家对那些封建思想文化的受害者的老秦(《李有才板话》)、金桂婆婆(《传家宝》)、软英的父亲(《邪不压正》)等人物及他们身上的落后面,在善意批评的同时都是怀着理解与同情的。这就改变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改造民间文化的理想化倾向,而展示了民间文化生态特有的生存、发展、变异的规律,是不可以急功近利地强行改造的。因而,作家对乡村民间文化中的落后习俗“理解多于批判”。笔者以为,透过赵树理乡土小说的平实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对民间文化生态的这种理解,已经具有了某种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和文化自足自律观点。

三

但我们也应看到,赵树理乡土小说在现代性意蕴下仍然摆脱不掉传统文学的框囿,或者说是传统文学的“载道”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归,只不过这时期所载之“道”因符合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获得了其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合法性。这种回归是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方向的一种文学应对,也有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的因素。赵树理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他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7]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不同:五四的“问题”主要是“人生问题”——婚姻问题、生计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而赵树理的“问题”是主要是农村政权改造问题、农民的“翻身”与“翻心”的问题;五四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关注的自我及社会问题,而赵树理的“问题”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与作家发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赵树理的“问题”必然最终会通过党的组织与党的引导得到解决,从而在作品的“大团圆”结局上体现了《讲话》关于作家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关系的精神。诚如周扬在评《小二黑结婚》时所说:“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8]

赵树理小说中的矛盾解决大多都是通过农村上一层组织机构的干预才得到解决的。小说《邪不压正》的结尾更发人深省:

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

“组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

小说中，下河村的问题在得到解决之后，上河村人又在盼望着工作团进村，可见农民自治能力的薄弱。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盼明君”、“盼清官”的旧意识在新的农村政权中仍然不可能得到完全改变，而把农村政权真正改造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正是当时共产党人所期望达到的政治目标，赵树理看到了这种目标实现必然遇到的困境，因而才会在小说中很婉曲地写出来，以期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也许就是赵树理小说之“为民请命”的民间传统情怀的一种表达吧。五四时代的乡土小说作家即如鲁迅、王鲁彦、许钦文、彭家煌等人，他们也都具有乡村文化生活背景，但他们都没有成为“赵树理”，而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在对故乡故土的忧患与思念中，始终保持着对那一方水土的理性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到了赵树理成名的时代，却不能不以一种曲折的、隐含的形态表现出来。并且这种批判意识，不再作为作品的一种文化气息从作品整体情蕴中体现出来，而是将其转变为对民间文化系统之外的另一新型文化的及其代表的歌颂方面去。这个代表就是现代文化的体现者——党和她在农村基层的工作人员。但新型现代文化又不可能由外而内强制性注入民间文化的肌体之内，而只能是由民间文化生态圈内部发生变化才有可能吸收新型文化。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在《李有才板话》中，知识分子出身的章工作员作为一种外在于农村文化系统之外的力量无法对“阎家山”的封建文化机制产生任何作用，只能在表面上换了个新招牌，而操纵村务的，还是村里的太上皇“阎恒元”。而“老杨同志”作为一个觉醒了真正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却能与农民在

思想感情上相通，能想农民所想，能团结“李有才”这样富有智慧却缺少革命力量外援的农民，发动群众，推翻农村的封建势力对农民的重压。这故事情节的意义在于：解放农民的最终还得是农民自己。民间文化要实现现代化更新，必须把民间文化内部的“李有才”们转变成一个“老杨同志”，那么代表民间文化中腐朽反动势力的“阎恒元”们才能被真正消灭，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才能实现新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统一。笔者以为，赵树理小说的这些思想文化内容，也许就是作家传统的、民间的文化情结与现代思想文化冲突、交融的结果吧。

参 考 文 献

- [1] 税海模. 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J]. 贵州社会科学, 2000, (3).
- [2]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A]. 赵树理文集(第4卷)[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1491.
- [3] 赵树理. 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A]. 赵树理文集(第4卷)[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1584-1585.
- [4] 陈思和. 民间文化心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钩沉[A]. 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C].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 [5] 胡适. 白话文学史·自序[A]. 胡适文集(第8卷)[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6]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A]. 赵树理文集(第4卷)[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1486.
- [7] 赵树理.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A]. 赵树理文集(第4卷)[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1651.
- [8] 周扬. 论赵树理的创作[A]. 赵树理文集(第1卷)[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 何旺生)

Folksy and Modern Quality of ZHAO Shu-li's Stories

JIANG Wei-she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ZHAO Shu-li's stories are folksy and modern. Their folksy quality is embodied in oral narration and their modern quality is embodied in Zhao's thought about the democracy, liber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ule of folk culture of Chinese countries. Zhao's modern thought is expressed in a special wa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ZHAO Shu-li's stories; folksy; modern